

文章编号:1674-8107(2016)02-0077-07

四渡赤水与毛泽东在党内的重新崛起

万义兵

(江西省党史研究室,江西 南昌 330006)

摘要: 四渡赤水是中央红军长征中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战役。中央红军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处境非常危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红军领导人,积极转变战略,充分发挥个人智慧,带领红军走出了困境,赢得了军心。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重新掌握了对红军的领导指挥权,实现了在党内的重新崛起。

关键词: 四渡赤水;毛泽东;崛起

中图分类号: G127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674-8107.2016.02.013

四渡赤水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极其重要的一系列战役,正是凭借这一系列战役,中央红军跳出了由湘军、黔军、滇军、川军组成的包围圈,打碎了蒋介石“剿匪成功,在此一举”的美梦,更重要的是红军找到了前进的方向,找回了制胜之法。在四渡赤水中,毛泽东凭借个人过人的胆识、高超的指挥才能,带领红军走出了困境,赢得了军心,重新掌握了对红军的领导指挥权,实现了在党内的重新崛起。

一

一般认为,“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1](P48)}但是,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无论从名义上还是实质上都是不够稳固的。首先,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并没有确定为总负责人,而只是被选为“常委”,排名第三位,位于张闻天和周恩来之后。在1月18日政治局会议常委分工时,决定“以毛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毛泽东只是回到军队领导岗位。但是“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最后决心的负责人”。^{[1](P42)}也即,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并没有获得军事上的最高指挥权,也没有成为

中共中央总负责人。所以,只能说“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起源于遵义会议,但在当时并没有明确这种地位。其次,根据陈云所记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扩大会中……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即李德)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1](P42)}由此可见,遵义会议上并没有取得完全的一致,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部分人仍然有抵抗情绪。虽然博古此时仍然作为总负责人,李德在会上受到了冷落,“被有意地排斥在中国人圈子之外”^{[2](P145)},但是,正如斯诺所了解:“在毛的地位得到巩固以后很久,博古在中央委员会中仍处于受信任的地位。李德也继续受到尊重,毛有意地经常找他咨询事务。”^{[3](P30)}可以看出,博古、李德虽然受到“冷落”,但他们作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言人”仍然手握尚方宝剑,自有不容忽视的相当能量。他们这种不满情绪对于毛泽东来说仍然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可能在任何条件成熟的时候发起反击。后来,红军在云南“鸡鸣三省”开会分工,会议“鉴于博古的精神状态,准备更换总负责,本来应由毛泽东担任,可毛泽东推辞,推举洛浦接替博古的职务”。^{[4](P167)}根据李庆山的推测,毛泽东的考虑之一便是:“中国共产党人仍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现在虽然中

收稿日期:2015-04-15

作者简介:万义兵(1984-),男,江西南昌人,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断联系,今后总要恢复联系的。我党更换主要领导,按规定要经过共产国际批准。……毛泽东从未去过苏联,共产国际对他没有直接接触,……马上一跃担任‘总负责’,不容易通过不说,还可能惹出麻烦。”^{[4](P168)}可见,毛泽东仍然非常看重“共产国际的批准”,顾虑共产国际的权威。

此外,从遵义会议决议可以证实,毛泽东确实没有取得“拍板”的绝对权力。在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扩大会议,产生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确定: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5](P1)}根据周恩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毛主席主张在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5](P5)}而在遵义会议上,“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1](P35)}也即毛泽东一贯主张的“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被否决。可见,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不得不做出了妥协。时任红五军团参谋长的陈伯钧在《从第五次反“围剿”到遵义会议》一文中说:“遵义会议是借了别人的码头打仗的。”^{[6](P214)}所谓“别人的码头”别有一番深意,表明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在“教条主义统治的中央”,他作为“排挤出来”的少数,能够把“事情说通,说得心服”,是“做了很多工作”的,是非常不容易的,因而对于遵义会议的结果,毛泽东基本上是接受的。陈伯钧评论道:“他(毛泽东)对政治路线根本不提,只谈军事路线。因为当时如果谈政治路线,牵连的面就更大了”。^{[6](P214)}当刘伯承、聂荣臻提出“打过长江,去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建议,毛泽东并没有据理力争,因为这场胜利是依靠“别人的码头”。因此,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并没有取得红军政治、军事上“拍板”的绝对权力,只取得了参与军事决策的资格。正如李德所说:“毛在遵义的‘胜利’并不是像我当时所感到的那样完美,他在政治局的统治也不是那么巩固。”^{[7](P122)}从这个意义上讲,遵义会议只能算是毛泽东重新崛起的一个重要起点。

一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按照会议确定的作战计划,迅速北上,准备在四川泸州西南的蓝田

坝、大渡口、江安一带北渡长江,进至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争取赤化四川。然而,事与愿违,中央红军在赤水、土城等地遭到川军的顽强阻击,战斗从1月24日打到28日,双方伤亡惨重。中央红军被迫撤出土城地区,准备一渡赤水。

在整个一渡赤水期间,毛泽东游离在决策层之外,其军事思想没有在军中得到完整贯彻。首先,如上所述,北上入川的作战计划是遵义会议的决定,毛泽东的初衷是在黔北建立根据地,这一建议并没有继续被采纳。其次,从中央红军的作战风格来说,毛泽东游击战争思想仍没有完全回到红军的作战之中。朱毛红军自井冈山斗争以来,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其核心就是知己知彼、机动灵活。在1935年中央军委下达的《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中,红军对北上入川、继而渡过长江的计划,可能遭遇到的情况不可谓不了解。《计划》中指出:“四川方面,刘湘判断我军入川,并渡江深入川中,因此刘敌第一步正调集约三个师八个旅在彭水、重庆、綦江、合江、泸州、叙州之线,企图堵我入川与渡江。”^{[8](P87)}可见,红军决策层对可能遭遇的抵抗有非常清晰的认知,而且朱德、刘伯承、杨尚昆等红军将领都是四川籍,且朱德、刘伯承都曾经在国民党中担任军职,对四川军阀的情况不可能一点不知。实际上,阻击中央红军的川军将领郭勋祺“与川籍共产党人杨闇公(杨尚昆之兄)、刘伯承、陈毅等人的关系非同一般,有很深的交往”^{[9](P435)}。聂荣臻是北上入川的建议者之一,他在回忆录中说道:“四川是西南首富,人烟稠密,四川军阀又横征暴敛,搞得民不聊生。”^{[10](P197)}由此作为入川的条件之一是牵强的。在“西南首富”的四川,“军阀横征暴敛”,导致“民不聊生”,恰恰说明军阀在四川势力强大,且人烟稠密,不难想见四川军阀“兵多将广”,而事实也正是如此。聂荣臻又说,“只要我们发动群众,站稳脚跟,就可大有作为”。^{[10](P197)}发动群众也许是红军的拿手好戏,假定红军能“站稳脚跟”显然是过于乐观。后来,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说:“如果今天来观察这个决定,我们应该批评这个决议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的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求达到这个目的具体步骤。而且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

过低的估计的。”^{[6](P35)}这个“抽象的条件”颇值得玩味,似乎指的是中央红军中存在的盲目乐观,如假定可以“发动群众”、“站稳脚跟”。陈云似乎在暗示红军领导层存在的一种情绪,这种情绪让他们不去“具体的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甚至“对四川敌人兵力过低的估计”,那就是“中共中央内部一直存在不愿入滇的情绪”。^{[9](P477)}因为南方条件艰苦,情况复杂,且有令人生畏的“少数民族势力”存在。相反,“四川经济上比黔北好”^{[1](P35)},因此北上四川,迅速同红四军会合,“毕其功于一役”,这是符合当时红军将士心理的。总之,这种不实事求是的盲目作战思维,绝对不是毛泽东运动战、游击战思想的题中之义。

再次,从中央军委发布的命令来看,土城战役绝对不是毛泽东倡导的运动战、游击战,而是消耗战、阵地战,同第五次反“围剿”的作战思想有极大的相似性。在1月20日中央军委发布的命令、电文中多次出现“决战”的字眼,如“我野战军应迅速向赤水及附近地域集中,以便争取渡过赤水的先机,在必要时并便于在赤水以东地域与追击和截击的敌人的一路进行决战”^{[11](P90)}。甚至要求部队“在尾追之敌紧追我后,而我渡赤水与渡长江发生极大困难,不能迅速渡河时,则应集结兵力突击尾追之敌,消灭且一部或多部”^{[8](P88)}。“于必要情况下与尾追和截击之黔军一部或协同其他兵团与黔军和薛岳兵团作战”^{[8](P89)}。这些命令无不透露出红军急于求成的心理,这种心理如同同一剂兴奋剂,让其可以无视敌人的强大与自己的弱小,直到遭遇挫折,才幡然醒悟。现实就是现实,与敌人“决战”、“对垒”是一条死巷,只能避敌锋芒,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由此可见,虽然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回到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但是在一渡赤水之前,毛泽东对中央红军的军事决策并没有发挥重大的领导作用。

三

事实胜于雄辩,土城战役的失利让中央红军明白“拉锯战”、“消耗战”是没有出路的,这是倡导“机动”作战思想的毛泽东回到真正决策层的契机。1月29日,红军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在川南,中央红军遭到了川军的猛烈追击,部队边打边

退,直到2月8日,各部主力先后到达云南扎西地区。

在这一过程中,中央红军的作战方向和风格渐渐发生改变。这种改变是形势所逼,面对强大的敌人,红军必须不断重新选择生存策略和空间。

2月2日,红二师包围叙永、东城,攻城战斗开始。红二师同敌人展开了阵地战,激战整日,不克。2月3日,红二师继续围攻叙永县城,遭到敌军的继续顽抗,且敌军南路总指挥潘文华急调章安平、达凤岗、刘兆黎诸旅向叙永紧急增援。由此可见,一渡赤水之后,中央红军仍然坚持阵地战、消耗战,这显然是不符合当时敌我力量的对比,因而受挫早已注定。

2月3日晚,中革军委发布《我军向分水岭等地前进及四日战斗部署》,要求:“我野战军为迅速脱离当前之地并集结全力行动,特改定分水岭、水潦、水田寨、扎西为总的行动目标。”^{[11](P121)}这说明部队已开始放弃阵地战、攻城战,并且改变北渡长江的计划。

2月6日,朱德电告红一、三军团:“根据目前敌情及渡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难,军委正在考虑渡江可能问题,如不可能,我野战军即应决心留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11](P134)}虽然电文中没有放弃渡江计划,但是考虑到电文中“创造新苏区”的主张,以及“应在长宁通扎西道口及扎西西北(即长宁西南),以便迅速集中,便于机动”^{[11](P134)}的部署,说明渡江已是备选方案,不是时下必须实现的目标。

2月7日,中央军委向各主力部队发布命令:“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江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8](P93)}这说明,红军领导层在北进受挫之后,终于不得不面对现实,放弃了渡江的计划。而由“黔西向黔东发展”虽语焉不详,但又似乎有似曾相似之感。至此,从土城战役失利之后放弃北上渡江计划改为西渡赤水,到古蔺、叙永受挫改取川滇黔边境,实现“决战”到“机动”的转变,中央红军变得越来越灵活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游击战术似乎又回来了。

我们无法证明毛泽东在这些转变中发挥了多少作用,但是可以看见的是,毛泽东倡导的红军作

战风格重新回到了队伍之中。也许这不是一个刻意人为的结果,而是战争实际的必然选择,所有这些量变的积累在扎西会议前后实现了质变。

2月5日到9日,中央政治局在扎西境内连续召开会议,史称“扎西会议”。扎西会议确定了红军“回兵黔北”的决策;张闻天代替博古成为总负责人;讨论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回兵黔北”等于认同了毛泽东当初建议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主张。鉴于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对毛泽东的鼎力支持,因而张闻天担任总负责人,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第一次系统地总结和肯定了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指出: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多次反‘围剿’胜利的战略战术原则是正确的”。^{[12](P9)}由此,奠定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在长征过程中的指导地位。毛泽东虽然还不是“总负责人”,但对于红军的决策有直接的影响,且立即在红军的行军作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月11日,在中革军委给红二、六军团的指示中充满了毛泽东运动战思想的色彩。电文中指示:“目前湘鄂敌人向你们进行的‘围剿’,是用了何键的全部兵力及徐源泉、郭汝栋等部,情形是严重的。但在你们正确灵活的领导下,是能够打破的。”^{[11](P168)}从电文中不难看出对运动战的信心,与其说红军领导层又重拾了对运动战的信心,不如说倡导运动战的红军指挥者回到了领导层之中。电文还指示:“你们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时,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的力量是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的活动。对敌人需采取疲惫、迷惑、引诱、欺骗等方式,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11](P168)}这封电文与其说是指示,不如说是经验之谈,红军长征以来,特别是湘江战役、土城战役的惨重代价,让红军决策层不难得出这样的经验教训。运动战又回来了,毛泽东又回来了。

四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毛泽东的意见在中共中

央中具有绝对的分量。现在缺的是理论之于实践的成功,而带领红军走出困境,找到红军渴望已久的扎根之地,是最响亮的回应。

在这之前,毛泽东仍然会受到怀疑和挑战。2月15日,中革军委发布《二渡赤水河的行动计划》,准备由林滩经太平渡至顺江场地段渡过赤水。“这时不少指战员对放弃北渡长江、改向黔北进军不理解,产生了埋怨情绪。”^{[13](P93)}这说明“回兵黔北”的策略仍没有获得红军战士的认同,他们仍然将“北渡长江”作为应该争取的目标,也许是当初勾勒的“北渡长江”的美景太过诱人,试想一旦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又将拥有如江西苏区时期的根据地,更紧迫的是,结束这种疲于奔命的作战生活,这正是时下红军战士普遍的心理需求。

就在《二渡赤水河的行动计划》发布的第二天,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了《告全体红军指战员书》,足见这种情绪的普遍性和强烈。文中恳切地陈述放弃北渡长江原因,因为敌人全力拦阻,中革军委顾全“红军的有生力量”,而不得不放弃当初的计划。在《行动计划》中,对未来可能遭遇的情况作出了预警:“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11](P72)}这可能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长征路上第一次明确阐述运动战的作战方针,从江西苏区出来的红军战士对这一套作战思路应该很熟悉。当薛岳2月初向蒋介石报告毛泽东重新上台的消息,蒋介石半信半疑。“一直到嫡系中央军在遵义打败所展示的红军用兵风格中,他才确定毛泽东的确上台了”。^{[9](P457)}

不过,运动战对于将士的确是不小的挑战,不但因为体力消耗特别之快,更重要的是那种忽左忽右的漂浮不定让人心惶惶。萧锋日记中就记述了一位红军战士的抱怨:“一天走个百儿八十里是小事,但转圈子受不了,一下东,一下西,像梭子似的,哪有个头?北上抗日什么时候到?”^{[14](P70)}这是中央红军领导层必须向战士解答的一个问题,而唯一的标准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带领红军冲出重围,走出迷途,走向胜利。

二渡赤水之后,红军先后取得了桐遵大捷,击溃和歼灭敌人两个师又8个团,俘敌约3000人,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这场战争的胜利对

红军来说是渴望已久的,对于刚取得红军指挥权的毛泽东来说也是及时的。娄山关大捷之后,毛泽东挥笔写成《忆秦娥·娄山关》。郭沫若曾对《忆秦娥·娄山关》作了注解,且煞费苦心地向竺可桢讨教,论证“西风”、“雁叫”、“霜晨”等景物出现在2月份的娄山地区是否可能。其实可能与否都无关紧要,诗词的意象只是诗人用来表达自己情感的工具,甚至有时仅仅为了词句的工整华丽而借用。笔者以为在《忆秦娥·娄山关》中,毛泽东最想表达的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一句,前半句意指革命道路的艰难,联想毛泽东自投身革命以来的经历,不难有这样的喟叹。而在当时,毛泽东最想表达的是下半句,娄山关大捷的胜利是自扎西会议以后,毛泽东倡导的运动战思想在军中贯彻以来取得的重大胜利,这宣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切实有效的。2月28日中央红军重占遵义,3月2日蒋介石由汉口飞往重庆,亲自策划部署对红军的新的围攻,在敌军合围遵义以前,中央红军准备撤出遵义,向鸭溪方向前进。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成立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至此,毛泽东在红军中的地位进一步得到稳固,进一步迈入了红军决策的核心圈。所谓时势造英雄,并不是说时代本身会造就英雄,而是时代需要英雄从而英雄自我涌现,个人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抓住机遇,勤勉努力,孜孜不倦,发挥聪明才智,站上历史大舞台。

对于此时的毛泽东来说,似乎所有的障碍都已扫除,博古、李德都退居二线,共产国际的指令也因为通讯中断而鞭长莫及,中央红军的决策权集中在以自己为代表的几个亲密战友手中。而打鼓新场风波却让毛泽东感到措手不及,大感意外。

在两次寻歼周浑元未果之后,3月10日林彪和聂荣臻致电军委:“关于目前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11](P254)}林、聂的建议立即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并开会讨论,与会代表多数支持这一建议,毛泽东虽据理力争并没有多少效果,最后毛泽东以卸任刚上任的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一职相胁,仍没有挽回局面。无奈的毛泽东当晚提着马灯来找周恩来商讨,终于取得了周的支持,这才平息了这场风波。这说明毛泽东虽然身居政治委员,在

关键时刻仍然不免沦为“少数派”,其地位并不稳。

实际上,此时中央红军采用的议事原则是猴场会议确定的:“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8](P63)}这一规定剥夺了李德和博古在军事决策上的拍板权力,在此时却成为毛泽东的绊脚石。在取得了张闻天、周恩来等人的同意之后,3月12日,在苟坝成立了新的“三人团”,成员有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为团长。至此,毛泽东进入了红军决策的核心之核心。

五

毛泽东虽然掌握了中央红军的指挥权,但是中央红军并没有完全脱离困境,数十万国民党军队仍在穷追不舍,重掌大权的毛泽东需要用事实来力证自己的军事思想的正确,带领中央红军找到扎根之地。三渡赤水、四渡赤水是毛泽东游击战军事思想的精彩展现,带领中央红军摆脱了敌人的围剿,从而在红军中进一步树立了威信,巩固了自己对中央红军的绝对领导权。

为了实现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构想,3月14日,中央红军攻打位于鲁班场的周浑元部。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且敌人又占据了有利地形,修筑了碉堡,虽然中央红军取得了一些局部胜利,但仍然没有将敌击溃。胜败乃兵家常事,关键是要正确面对失败,及时改弦更张,而这正是毛泽东的拿手好戏。15日,中央军委决定各军团主力撤出战斗;16日中央军委发布了《三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16、17日中央红军渡赤水,进入了川南,摆脱了敌人的围剿。当国民党军队向川南赶来之时,中央红军作出了四渡赤水的决定,并于3月21日夜至22日晨第四次渡过赤水河。红九军团伪装成主力,在长干山、枫香坝等地活动,中央红军其他部队向黔北转移,中央红军全部到达黔北的三四天时间里,国民党军队仍以为中央红军“大部尚在镇龙山、铁厂”^{[15](P63)};第二路总指挥龙云继续命令追剿部队“聚歼该匪于叙(永)、古(蔺)以南,赤水以西,毕节、怀仁以北地区”^{[15](P637)};直到25日,龙云仍然命令将红军歼灭于“铁厂、镇龙山、石宝寨、大村间地区”^{[15](P640)};26日,薛岳仍然错误地估计红军从古蔺“续行西窜成分居多”^{[15](P647)}。3月28日,红九军团继续伪装成主力向北进军迷惑敌人,中

央红军主力部队则急速南下。3月31日,中央红军主力南渡乌江,先头部队于4月2日逼近贵阳。4月8日,红一军团一部攻占贵阳城北的扎佐镇,进一步威逼贵阳。此时贵阳城内兵力空虚,亲自来贵阳“督剿”的蒋介石顿时惊慌失措,急电滇军孙渡部来贵阳护驾,从而为中央红军敞开了云南的大门。中央红军趁机向云南方向挺进。4月23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胜利离开贵州,进入云南。5月3日至9日渡过金沙江,跳出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把敌人远远地甩在身后。此时的中央红军犹如一条飞龙,忽东忽西,忽左忽右,令蒋介石眼花缭乱,捉摸不透。

从鲁班场战斗打响到三渡赤水,前后仅为3天时间。四渡赤水和三渡赤水之间仅仅相隔4天。而一渡赤水从1935年1月19日《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颁布到1月29日红军才完成了一渡赤水,前后共11天。二渡赤水从1月29日红军进入川南开始,到2月21日才完成。为什么有如此差异?因为一渡赤水、二渡赤水时候的中央红军还没有找回运动战、游击战的要诀,仍然坚持打阵地战、消耗战,只有在万不得已才肯撤退;三渡赤水、

四渡赤水更多的是一种战术行动,是中央红军为避敌锋芒的主动撤退,是运动战、游击战思想指导下的回旋。如果说一渡赤水之后的扎西会议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回归,那么三、四渡赤水则让毛泽东站稳了脚跟,让其军事思想在全军上下得到完整贯彻。

虽然仍然有一些杂音,如林彪对这种飘忽不定的游击战术曾颇有微词,但是这不妨碍毛泽东已成为中央红军首屈一指的领导人,在中央红军中享有绝对的权威。毛泽东的重新崛起靠的是“阳谋”,不是“阴谋”,因为在长征途中,在生与死的抉择面前,没有任何“阴谋家”能滥竽充数,红军要的是胜利,是生存,是重新找到落脚之处,而这些都是靠“阴谋”能实现的。毛泽东靠的是天才智慧,这是他成功的核心资本,而四渡赤水的战场就是这种天才智慧的演习场,在这里毛泽东成功了,毛泽东从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到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再到党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逐步确立了在全党全军的军事领导地位。无怪乎毛泽东将“四渡赤水”视为其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因为正是在此过程中,毛泽东完成了重新崛起。

参 考 文 献

- [1]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遵义会议文献[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2]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M].过家鼎,等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 [3] [美]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国杂记[M].党英凡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83.
- [4] 李庆山.大长征[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 [5] 中共黎平县委党史办.黎平会议——红军在黎平资料汇辑2[Z].内部资料,1985.
- [6] 曲青山.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第1册(政治卷上)[M].济南:济南出版社,2012.
- [7] [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3-1939)[M].李亚红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
- [8] 中央档案馆.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Z].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
- [9] 金一南.苦难辉煌[M].北京:华艺出版社,2009.
- [10]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
- [11] 吴德坤.遵义会议前后红军军事电文选编[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2] 侯兴福.光辉的扎西会议[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
- [13] 刘华清.聚焦长征:长征中的重大战略决策[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 [14] 萧锋.长征日记[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 [15] 《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贵州省博物馆.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Z].内部资料,1982.

The Central Red Army's Four Crossings of Cishui River and Mao Zedong's Comeback to CPC Summit

WAN Yi-bin

(Sector for Research of Party History, CPC Jiangxi Provincial Committee, Nanchang 330066, China)

Abstract: The four crossings of Cishui River is a series of important campaigns in the Central Red Army's Long March. At the critical point of Facing the besieging of numerous Kuomintang troops, the Army leaders, represented by Mao Zedong, changed their strategies and had full play of their individual wisdom, and thus guided the Army out of the difficult situation. In the campaigns, Mao won the supports of soldiers and regained his command over the Army, through which he realized his comeback to CPC summit.

Key words: Four Crossings of Cishui River; Mao Zedong; Comeback to Summit

(责任编辑:韩 曦)

(上接第 28 页)

On the Features of Red Resources and Their Values for Practice Education—with Examples of the Class of Moral Qualities and Legal Rudiments

YAN Zhao-fei, SONG Bin-hua

(Jiangxi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Nanchang 330045, China)

Abstract: Moral Qualities and Legal Rudiments (MQLR) is a class which helps college students to establish correct views on world, life, values, moralities and laws so that they can improve their qualities. As historical outcomes of China's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Red Resources are characterized in their vivid forms, rich connotations, wide distribution and strong sense of history, which makes them consistent with the educations contents and goals of MQLR class. The resources are valuable for the class for better guidance of political direction, moral examples, education contents, rich teaching form and more desirable education effects. They are quality education resources for the practice education for MQLR.

Key words: Red Resources; features; Moral Qualities and Legal Rudiments; practice education; values

(责任编辑:曾琼芳)